第四部

民　　主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第九章
天皇制民主：楔入

直到日本投降，天皇一直是国民教化的最高的献身对象。每个奔赴 277
战场的士兵都随身携带着《战阵训》，开篇是："夫战阵者，乃基于大命，发挥皇军之神髓，攻必取，战必胜，遍宣皇道，使敌仰御稜威之尊严而感铭之处也。"袭击珍珠港之前4个月，一本重要的小册子《臣民の道》出版。执笔的御用理论家不厌其烦地强调，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日本是神统治的国家。"皇国臣民之道需排除自我功利之思想，第一要义乃奉仕国家，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忠与孝是帝国最高之美德，《臣民の道》极力谴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唯物主义"败坏了淳风美俗。天皇裕仁神圣不可侵犯。天皇领导的战争是圣战。天皇所体现的德行是唯一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1]

然而事实证明，天皇裕仁也善于随机应变。当他身边忠心不二的臣 278
子纷纷被问责、开除公职、追诉战争罪行乃至处以极刑之时，天皇本人却仰赖天助，具体而言是有赖于麦克阿瑟将军相助，终能全身而退，毫发无损。天皇在日本侵略行径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未被认真追究。甚至连为以天皇的名义或者在天皇准许下进行的镇压和暴力行为承担道义上的责任，都受到了美国人的劝阻。当天皇身边的人提出天皇退位的可能性时，最高统帅也断然拒绝。实际上，占领军当局选择了不仅将天皇个人从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圣战中解脱出来，而且将天皇重新置于了新生民主国家的中心。

天皇的这种魔法般的变身，在政治和思想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义被肆意抛弃。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严肃追究被引入歧途：既然国家政

治和精神的最高领袖对最近的事态发展都不负责任，那么何以指望他的普通臣民能够自我反省？战后的政治意识变得混乱不堪。尽管由最高统帅部起草的新宪法，将天皇重新定义为“国家的象征与国民统合的象征，其地位是基于行使主权的日本国民之总意”，但是维持天皇制与重新神化裕仁个人——这本来是两回事，尽管经常被混为一谈——却严重损害了国民的主权地位。通过这位“象征的”君主，世袭特权得到了重新肯定，同时天皇依然是这个国家父权制至高的标志。尽管在日本早期也曾有过女天皇的统治，然而战胜者仅准许日本延续男子继承王位的近代传统。此外，天皇仍然是所谓的人种的纯粹性与文化的同质性的体现者。

从这一角度看来，“国民统合”实际上是表达旧有“家国”思想的新形式。和谐与等级被认为在价值上高于竞争和个性，新的天皇象征仍然体现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所发明的“大和民族”的特性，从而排斥朝鲜人、台湾（地区）人、中国人、高加索人等一切外来人种成其为“日本人”。抛开宗教和国家的正式分别不谈，天皇仍然是日本本土神道教的大祭司，在皇宫中举行深奥的仪式，并前往伊势神宫向他的神的祖先禀告。所有这一切仍然让他成为种族隔离和血统民族主义的最高偶像，体现着想象中的、使日本人有别于并优越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所谓永恒本质。

279

以君主统治年数来纪年的年号制，在当今日本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一特殊“传统”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因而始于 1926 年裕仁天皇即位的“昭和”时代从未中断，无疑是过去的根基的连续性的历法宣言。[2] 昭和时代一直持续到 1989 年才终结，直到这位战前意识形态理论家们供奉的从前的“现御神”（以人的姿态存在的神），终于在 89 岁高龄过世。以日本历法计，裕仁天皇逝于昭和六十四年，占领期（昭和二十年到昭和二十七年）不过是他统治时期中短暂的插曲。对于保守派而言，这是贬低战败时期重要性的绝好方法，而天皇本人晚年也一直强调，日本的价值观没有变化。[3]

天皇制具有不可否认的巨大魅力。即便日本共产党一涉及天皇问题，也会跌跤、出丑。然而当日本战败之时，天皇制，当然还有裕仁本人，正处于极端的危机状态。日本的精英分子们在其一生中，目睹了世

界上许多看起来伟大强盛的君主制的崩溃，这通常发生于战争结束之时。而在日本国内，破除旧习者敢于公然嘲笑天皇。在战胜的各同盟国内，要求将裕仁作为战争罪犯进行起诉的呼声很高而且持续不断。甚至是强力拥护天皇制的外国人士，如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也确信，至少天皇无法推脱签署宣战诏书之责。日本投降后数月，格鲁仍然设想“裕仁将不得不退位”。[4] 天皇近侧的许多顾问也畏惧这确将成为现实，因而到 1946 年，日本政府主要致力于不但护持“国体”，而且确保现任天皇在位。

吉田茂在其自传中，赞扬麦克阿瑟是日本的“伟大恩人”，这不是指他带来了民主的礼物（对此吉田抱有相当的保留态度），而是指最高司令官在空前的危难之中，维持了君主制并拥护令人敬畏的现君主。[5] 吉田是对的：盟军最高统帅在这些事务上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回想起来这也是可以预见的，因为最高司令官有关处置天皇的政策，早在投降之前就确立了。

心理战与“天子”

麦克阿瑟战时司令部的心理战专家们，自然是全神贯注于当前的军 280
事目标，而非战后的计划。虽然如此，他们提出的加速前线日本军队投降并破坏日本本土士气的建议，却是建立在对战后也不曾变更的敌人行为模式分析的基础之上。战时研究的几位关键人物，将会陪伴麦克阿瑟抵达东京，并继续为有关天皇的事务出谋划策。

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邦纳·费勒斯（Bonner F. Fellers）准将的影响力更为重要了。他是麦克阿瑟的军事秘书和心理战行动的负责人。费勒斯早年是位日本人心理分析专家，1934—1935 年以陆军上尉衔，进入设立于 Fort Leavenworth 的司令部与总参谋部的幕僚学校。在那里，他完成了一份名为《日本兵的心理》（*The Psychology of the Japanese Soldier*）的研究报告，此报告颇具先见之明，而费勒斯本人也一直坚守此立场。在报告中，费勒斯早在 4 年前就预见了日美战争的爆发，甚至预言了一旦战争形势恶化，日本将采取自杀式的神风特攻队战术。日本人的忠心和军纪的严明使他感铭于内，尤其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临阵脱逃的高比率形成了鲜明对照。他总结说：“在思想方式上，今日之

日本人与美国人差异如此之大，宛如一直生活于不同的世界，分隔了数百光年之远。”他顺便述及，日本人将西方式的民主看作是“一时的性格”。1944 年夏，当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开始严正敦促日本人在战场上投降时，费勒斯制定了《日本解答》（*Answer to Japan*），这份报告实际是他的“心理学”研究的修订版，并被用作同盟国情报人员的指南。另外，费勒斯继续向军界的熟人们散播他昔日的论文。1944 年他向其中一位提及：“今天我仍然可以对此研究一字不改。”[6]

尽管费勒斯可以接收到大量的原始的和经过加工处理的情报素材，包括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公文、信函和日记，报纸和广播的译稿，战俘的供词，此外更不用说还有各式谍报机关的报告，然而他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随手可得的英文出版物。实际上，他宣称“现有的关于日本人心理研究最好的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部经典著作：小泉八云的《日本：一个解释的尝试》（*Japan —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7] 费勒斯及其研究人员依据这些内部资料与公开出版物对日本人心理描绘的轮廓，至少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的优点。因为依据大多数官方文件，一旦麦克阿瑟的部下们将观点写成了报告书，就会不断地在其后的报告中蹈袭。单单通过不断的重复，早期的不确定的看法，很快就会被罩上真理的光环。

281

到 1944 年中期，费勒斯阐明了对天皇的角色的看法，此后这一说法在本质上一直没有变更。麦克阿瑟有关天皇的政策，显然不是对战败后日本真实状况的任何严肃调查的结果，而是来源于他自己司令部的一位业余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所作的战时分析。他后来在占领初期的声明和决定，最早的脚本都可以在费勒斯及其部下的政策建议中发现。

作为一条基本规则，麦克阿瑟的宣传专家们注意实行避免因为攻击天皇而激怒敌人的战时方针。[8] 这与一般的美国战争方针相一致，后者禁止针对皇宫的军事袭击，甚至是口头上中伤裕仁天皇的宣传。虽然这种克制表面上的理由是：日本人对天皇具有宗教性的敬畏，如果天皇受到攻击，日本人甚至更易于顽抗到死，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考虑。1944 年 7 月，战略作战局（O. S. S.）的一份内部报告称，“除掉现任天皇的意愿值得怀疑。天皇个人更倾向于稳健派，将来可能会产生有用的影响”。[9]

像 O. S. S. 与其他情报机关一样，在战争的后半段，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相信天皇掌握着不仅是日本投降而且还有战后变革的关键。如费勒斯及其部下所言，目标就是要通过说服日本人“军国主义分子”不仅愚弄了他们，而且背弃了他们的圣主，从而在军部领导人和天皇（及其臣民）之间“钉入楔子”。一句话，西方的宣传家们预备介入重新建构天皇的形象，将天皇与近二十年来以其名、在其治下并且由其积极协力的日本帝国的诸政策相分离。

有一次，费勒斯坦承“作为天皇和公认的国家首脑，裕仁不可能逃避战争罪行。他是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而且必须被看作是太平洋战争的挑起者”。[10] 然而在他的《日本解答》的结论中，他发出了迥乎不同的 282
声音。他指出，天皇将不仅对影响日军投降不可或缺，而且还是战后组建和平倾向政府的精神核心。这一政府被假设将由现已年长的保守派精英们组成，包括那些早在军国主义分子上台之前就已执掌大权的贵族的袭承爵位的子孙们。这一结论值得大段征引，因为历经一年时间和数百万人的战死之后，将由费勒斯重提这些见解，以助麦克阿瑟论证保留天皇制还有裕仁在位的正当性：

> 对于东方的持久和平而言，日本完全的、无条件的投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经过彻底的军事灾难和由此带来的混乱后果，日本人民才能从他们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民族、注定要成为亚洲霸主的狂热说教中醒悟过来。只有战败及巨大伤亡的刺痛，才能使人民相信军国主义体制是可以被打倒的，他们狂热的领导阶层将他们引向了灾难之路。
>
> 日本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是顽强坚忍的。但是在对日本本土人民极端痛苦折磨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希望冷静的保守派能够顷刻之间看到光明，并及时拯救自我。
>
> 一败涂地的战争结局将使所有人明了，军国主义分子愚弄了他们的人民。
>
> 但这不是全部。要让民众意识到，军国主义分子背弃了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的信赖。他们将天子，帝国的神圣统治者，引向了毁灭的悬崖。那些欺瞒天皇的人不能在日本存在。当这种意识出

现，长期潜伏的保守派，日本的宽容的势力，将可能会发挥出真正的价值。他们可能会有充分的领导能力掌握政府，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保有残存的日本列岛、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天皇。由天皇许可的和平，将会得到全体的接受。以这种方式，我们的对日战争，有可能在必须完全毁灭日本之前得以终结。

在和平条款上决不能手软。然而，废黜或是绞死天皇，将会引发全体日本人极大的激烈反应。绞杀天皇对他们而言，就相当于对我们来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人将像蚂蚁一样奋战到死。军国主义分子的地位将被无限巩固。战争将会过度拖延。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为惨重的伤亡代价。

我们中有些人鼓吹对全体日本人的屠杀，实际上是种族灭绝。亚洲战争已经带来了如此之多的痛苦，带走了如此之多的生命，对日本人而言任何命运已皆不足惧。可是，一旦日本的武装军队被摧毁，军阀倒台，人民彻底知悉战争的恐怖，就有把握停止屠杀。无辜受死的平民越多，生者的感觉就会越痛苦、越持久。我们执行屠杀的青年一代将会精神失衡。这将有悖于我们的基督教信仰。

美国人必须引导而非追随事态的发展。在恰当的时机，我们将允许在天皇及其臣民与东京的军国主义分子双方之间“钉入楔子”。如果我们对敌人了若指掌并巧妙处置，将会避免数年的浴血奋战。当日本被完全打败之后，美国式的正义必须应当成为道义和光明所在。

只对天皇负责的独立的日本军队，是对和平的永久威胁。但是天皇对其臣民的神秘掌控和神道信仰的精神力量，如适当引导则不一定造成威胁。如果日本完全战败，军阀倒台，天皇可能成为促进善与和平的力量。

日本政府必须要有权力分散、相互制衡的组织体系。天皇周围的领导层必须是非军人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官。武装组织必须仅限于维持国内治安的警察部队，由非军人的当局负责。（中略）

一旦东京的军国主义势力灭绝，日本军队被摧毁，天皇治下的自由主义政府成立，极度悲伤、人数减少但是更为贤明的日本人民，就能开始他们人生的重新定位。[11]

这种对天皇潜在的正面作用及其事实上对日本人心理极端的“精神”支配力的满怀敬意的评价，将成为战后对日政策的基石。1945 年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在马尼拉召集了英美联军心理战人员会议。在那里，费勒斯和他的部下们将可资联军利用的“日本人行为模式”，扼要 284
归纳为十五条要点：“自卑情结、轻信、群体型思维、歪曲事物的倾向、自我吹嘘、强烈的责任感、超常的攻击性、野蛮、顽固、自我毁灭的传统、迷信、重视体面、多愁善感、对家国的忠爱和天皇崇拜。”[12] 马尼拉会议没有在讨论天皇问题上耗费时间，但却提出了诸如“将天皇归还于人民”的对敌宣传口号。“楔入”政策得到了认可，并同意在“适当的时机”，利用天皇“促进达成我们的目标”。一次，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海军情报官员郑重提议，将联军战舰外舷绘上天皇的肖像，以阻止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袭击。[13] 仅是想象一下如此这般联军舰队的景象（以及在英美本土放映的新闻纪录片中这将会是如何情形），就足以令人打退堂鼓了，但这却足以说明天皇问题在这些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有关天皇的最为激情的评论，来自陆军上校西德尼·马士伯（Sidney Mashbir）。他是同盟国翻译通译局（ATIS）局长，也是费勒斯信赖的副手之一。在一次口头发言的记录（注：此记录中包含以括号补足的部分，然大意不变）中，马士伯宣称“杀掉天皇是极大的愚蠢行为，天皇仅是两千五百年来的渎神行为（近亲结婚）的产物。你不可能通过杀掉天皇消除日本人的天皇崇拜（天皇只是日本人祖先崇拜体系的一环而已），正如你不可能通过否认耶稣的神性而毁灭基督教一样。”针对某一提问，马士伯的回答强调，“的确要依赖他们对天皇的盲目追随”。[14]

马尼拉会议上，参与者被直言不讳地告知，“西方逻辑组织严密，与日本人的心理不调和”，日本人完全没有能力理解美国式的民主。在这次会议上费勒斯分发的一份秘密资料，明确表述了这一点：

> 日本人自认为是神，不知道也完全不能理解以下所列的民主或美国的政治理想：
>
> (1) 我们的《独立宣言》。
>
> (2) 我们合众国的宪法。 285
>
> (3) 大西洋宪章。

(4) 对人种、宗教的宽容精神。

(5) 无公正裁判就不可处罚的原则。

(6) 反对奴隶制。

(7) 个人的尊严。

(8) 对人民绝对的信赖。[15]

日本投降的前月，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心理作战部门，有机会通过短波广播直接向日本本岛实行楔入战术。马士伯上校在起草和发布一系列日文广播中起了关键作用，而他的方式直率到了粗暴的地步："军国主义分子"或曰"军阀"打破了他们对天皇的"神圣誓言"，"并陷祖国于灾难"或是"允许灾难降临天皇的国度"而受到嘲讽痛骂。马士伯的提问富于煽动性："日本的军官是否能够像要求战士那样，完璧般地忠诚奉仕于天皇?"同盟国的使命是"驱逐一度掌控日本人民的军阀魔鬼"，让臣民们达成重新接触了解天皇的意愿。(马士伯的广播，有时听上去就像是他要向天皇的核心集团求职一般。)[16]

费勒斯的日本观要比他的副手精练、复杂得多。在日本投降后的一封私人信函中，他倾吐自己"从 1922 年就爱上了日本"。这种情绪对于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军军官而言自然十分难得，而费勒斯对那场可怕战事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1945 年 1 月，当有位陆军上尉报告说，美军通常在战场上杀死企图投降的日本人时，费勒斯以战术理由对此进行了谴责。既然美国人空投传单敦促日本人投降，他觉得"事关国家的荣誉，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承诺，尤其是对待敌人。另外，我们需要俘虏，因为他们总能吐露实情，而情报能够救人的命"。然而，当谈到美军对日本城市的密集轰炸时，他对此进行了无条件的批判。在 1945 年 6 月 17 日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费勒斯将此形容为"全部历史上对非战斗员最残忍和野蛮的屠杀行为之一"。[17] 当亚洲战争迫近其悲惨结局之时，他仍然直率地认定这是一场种族战争。他在日本投降前一周写道："欧洲的战争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战争"，然而"在太平洋地区则是种族战争"。要实现和平的构想，必须认识到"白种人作为东方领主的时代结束了"。他坚持"美国人在东方的地位，不能建立在白种至上论的基础上"。"东方人必须被置于与我们完全平等的地位……必须打破以人种为理由的禁

忌。”[18]

费勒斯与日本的上层阶级有个人关联。最亲密的联系是他的堂姊妹格温（Gwen）嫁给了日本外交官寺崎英成。在日本战败之后，寺崎受日本皇室托付，为费勒斯及其他 GHQ 官员充当联络员，极大地推动了天皇周边与占领军最高层之间的意见协调工作。麦克阿瑟没有这样的私人纽带，但是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作为现场指挥官驻留菲律宾的经验，同样使他相信，未来亚洲将会对世界局势的制衡起到支配作用，因而对西方人来说，着手纠正过去的不平等关系至为重要。既然他有这种先见之明，同时又认定亚洲在文化和政治上落后，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地认为，远东国家仍然得由他这样的权威人物引导而进入这一新的时代。至于说到战败的日本，这种见解自然就会导致利用天皇实行强有力的双重统治的设想。

麦克阿瑟在实际被任命为同盟国占领军的首脑之前许久，就已经接受了楔入策略。据他的私人医生、有时也是他倾吐心事的知己罗杰·埃格伯格（Roger Egeberg）回忆，1945 年 5 月在马尼拉，将军指着自己的胸膛，“说他想实现为日本带来民主的和平。更有甚者，他认为天皇不过是被东条英机和军阀们所俘虏，他们才真正应当为战争负责，而裕仁天皇则有助于永远改变日本的统治结构”。8 月 6 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当天（但在原爆消息抵达之前），麦克阿瑟在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描述天皇是“名义上的元首，但却不是傀儡”。当还在马尼拉为他的日本新任使命做准备时，麦克阿瑟告诉马士伯上校，“我绝不想在日本人心目中贬低天皇，因为通过他，有可能维持完全的统治秩序”。他还希望天皇于他抵达日本之后来访。而密苏里号投降仪式的次日，就由马士伯向日方转达了这一邀请。[19]

净化天皇

天皇的终战广播，事实上是日本宫廷和政府联手“护持国体”的一系列宏大战略发动的信号。7 个小时之后，铃木贯太郎首相向全国广播演说：“陛下为拯救万民并为人类的幸福和平做贡献计，圣裁决断终止战争。陛下仁慈之圣明，本身就是对国体的护持。”这位老迈的退役海军大将继续发表宣言，举国应向天皇“真诚谢罪”，这是因未能赢得战

287

争而谢罪。“无论何种境地，不管生死与否，我们作臣子的本分，就是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20]

这出以天皇为主角的新戏，其华丽的主旋律在战败之后的声明中有细致的演绎。当天皇被描绘为一位宽宏大量的和平使者之时，他的全体臣民则承担罪责，不为军国主义的兴起与侵略，却为未能赢得圣战而歉疚。日本人被分成了天皇与其他全体国民两部分。当论及战败责任，突然之间最低贱的草民与身上挂满勋章缎带、最显赫的官员们变得平等了。在追究责任问题上，守旧派急匆匆地支持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纯粹的民主。

在麦克阿瑟抵达日本之前的两周，公众人物不断重申这些主旋律，公众媒体则大加唱和。8 月 28 日，全体（天皇除外）责任论发展到了完美的表述。铃木贯太郎之后继任首相的东久迩稔彦亲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一亿国民总忏悔”是重建国家关键的第一步。9 月 4 日第 88 回帝国会议开幕，东久迩首相不惜盛赞天皇“为拯救国民出离苦境而树立恒久和平”铺平了道路。首相大叹“为引起陛下如此忧心操劳我们深切反省”。[21] 假使外星人听到这样的演说，将很容易认为裕仁天皇是在 1945 年 8 月才登基，正好及时终止了可怕的战争。何况除了天皇，任何其他人的感觉都无关紧要。

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签署投降文书，在占领军进驻之后的 8 月末的惨淡日子里，为天皇尽忠不遗余力。在美国人面前，他赞扬天皇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正如费勒斯在战时报告书中所言），并警告说，任何废除天皇制的企图，都会招致国民革命蜂起。同时，他向天皇深思熟虑地建议，顺应不可避免的改革浪潮。9 月 1 日在长时间拜见天皇时，重光葵以“臣 葵”之名上奏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相当于“楔入战略”的日本版。

重光葵向天皇保证，《波茨坦宣言》的要求具有灵活性，不包含任何妨碍日本重建的事项。近来日本的失误，是由于明治维新之后，天皇之心与国民之心的一体性丧失，而军部乘机插入天皇与臣民之间所致。真正的“我国本然之精神”本质上是民主的，包括尊重基本人权以及思想、宗教和言论自由。《波茨坦宣言》要求的民主，将在天皇之思与臣民之心重归一体时实现。“帝国”应当以比明治初期加倍的热情致力于

民主改革。翌日，重光葵为自己忠臣的角色写了两首短歌。其中一首，他以君主的“盾牌”自况。在另一首中，他期待一旦国家繁荣，由于他是投降文件的签署者而受人们轻蔑的日子终将会到来。[22]

诚然，重光的议论有些让人难以相信的感觉。似乎天皇的忠良臣仆昨日还在宣扬的反对民主的“臣民之道”，不过是一时失言而已。假使一个月前，重光有勇无谋地公开宣称国体与西方式民主是和谐一致的话，十有八九他会被送进监狱（或者精神病院）。而且十有八九天皇会默认他的消失，正如天皇默认弹压那些以其名义批判政府政策、教义的人一样。然而，在战败的新形势下，天皇对他的外务大臣的见解表示同意，并记在心上以备将来之用。

9月3日，重光葵将他要做君主的“盾牌”的新誓言付诸行动。在秘密会见中，重光当面向麦克阿瑟提出了天皇无罪和军国主义分子阴谋论的主张。这次会见重光葵的直接目的，在于说服最高统帅放弃对日本实行直接的军政统治。他告诉将军，“我皇室在历史上始终是和平主义者”，裕仁天皇也不例外。天皇反对近来的战争，一直致力于寻求和平，并为终结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重光葵强调天皇理解《波茨坦宣言》的诸条件，并完全支持其用意。另外，天皇享有他的臣民的“绝对崇拜”。由此，盟军最高司令部实施《波茨坦宣言》最简易的方法，即“奉天皇之命由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的统治。[23]

重光葵的话立即得到了麦克阿瑟的认可，当这位外务大臣还坐在将军办公室里的时候，麦克阿瑟就已下令放弃直接军事统治。（重光不知道，最高司令官已然接到华盛顿准许间接统治的指令。）这是一场“协议计划”的开端。日本政府的旧高官和高级军人向占领军当局“简要说明”天皇起先并未介入战争，正如后来流行的说法，天皇直到出席御前会议的6位文武大臣僵持不下时，才插手打破僵局，并成为投降的决定性因素。而占领军方面也加以呼应，积极鼓励天皇的近臣们继续将天皇塑造为和平主义的统治者形象。[24]

重光葵随后被以“甲级”战犯嫌疑起诉，他因推进日本的侵略外交的罪名成立，被判处监禁，最终成为了保卫天皇皇位的盾牌。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昭和天皇并非是一位雄辩之人，他甚至连普通会话也未能应付裕

如。他有智慧，但似乎并不善于反省。他作为王位继承人所受的教育，显然是严苛而教条的，或许这正是因为他的父亲大正天皇心智无能的缘故。他向来非常自信，但从不显露出过分的傲慢。他总是小心谨慎，神
290 经质地关注细节。战败之前没有证据表明，“民主”会引起他任何真正的兴趣，除了可能使局势失控的威胁之外。另一方面，有充分证据表明，他倾向于专断。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遇有必要他总是包揽施政的主导权。

天皇对于战争的缺乏自省，在9月9日他写给其长子、12岁的皇太子明仁的一封罕见的短信中流露出来。外人可能会想象，在这种时刻，这样的交流应当既有深刻思考又富于实效。这种反省在日本传统著作中不乏先例，但是却并非裕仁天皇所长。他写给儿子的信既晦涩难懂又枯燥无味。正如当时大多数的官方说教一样，他关注的不是战争的起因，而是“战败的原因”。在这非常时刻最私密的信件中，天皇强调的是军部近臣的失策，根本就没有提到重光葵热切鼓吹的所谓民主理想。

裕仁解释说，日本战败是因为“我们国人”太轻视英美人了。军部过于强调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力量。尽管明治天皇手下不乏得力的名将，而当今时代他自己的大臣们却未能把握大局。他们只知进却不知退。天皇总结说，如果战争继续，他将无法保全“三件神器”（镜、剑、玉），而大多数国民将遭杀戮。因而，他忍悲吞声，接受战败“以保留国民之种”。[25]

这看上去或许有些奇异：天皇在批评军部不理性的同时，却如此动情地关注三件神器。但他确曾在为投降苦恼之时，不厌其详地谈论这些神器，而且在次年春天向侍从口述他的战争记忆时又如法炮制。神圣的镜、剑、玉让裕仁如此着迷，看来不仅因为它们是正统和威严的象征，而且还是维持建国神话、追溯皇统起源的神器。三件神器是具体体现日本精神的最珍贵器物，而谈论它们与前述“国民之种”的难堪表达一样，是传达天皇作为神圣皇统继承人的表达方式。天皇从未，即便是在4个月后著名的“人间宣言”中，也未曾否定自己是天照大神子孙的神话。[26]

291 从另一份珍贵的私人文件——皇太子日记中，我们可以找到当时宫廷周边有关战败原因的更为神秘有趣的解释。在其父皇的终战广播不

久，明仁尽职尽责地记录了日本战败的两个根本原因：物质的落后，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不足，与个人的自私自利。年轻诚恳的皇储明白写到：单个比较起来，日本人要优于美国人，但在团体较量上，美国人占优势。因而未来的关键在于发展科学，以及学习像美国人那样整个国家融洽合作。对于利己的西方人与集团性的日本人，其文化误读竟至如此![27]

天皇的信和皇太子的日记都是私人记录，多年来公众对此并不知情。而另一方面，“楔入策略”的伟大计划、妖魔化军部、将天皇塑造为和平主义者并建立天皇制民主，却是大肆公然的行为。美日双方都利用公众媒体，实现他们最终趋同的目标。例如9月21日，麦克阿瑟告知美国合众国际社，由于保留了天皇，从而“使美国无数的生命、金钱和时间免于损失”。[28] 3天后，《纽约时报》头版以《裕仁在会谈中谴责东条英机偷袭珍珠港并表示现在他反对战争》为题，破天荒地刊登了对天皇的“访谈”。此访谈主要是基于天皇对事先提问的书面答复而成。这些答复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实际是由重光葵的外务省起草的，让天皇坚称“他无意使自己的宣战诏书在日本袭击珍珠港时，被前首相东条英机以如此方式使用。他说自己希望东条在必要时以正常、正式的方式宣战”。在此访谈的补充纪要中，天皇最信赖的顾问木户幸一解释声明说：“裕仁事先并不知道袭击珍珠港，他是后来从宫中的收音机广播上听说的。”[29]

这是掩饰之辞，但却正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楔入策略”论者想要听到的。数周后，呈交给天皇机敏的侍从次长木下道雄的一份秘密报告，表明了这样的回答实际上是多么地误导他人。写报告的军部武官总结说：“显然，作为统治者，他（天皇）应当为国家的战争负责，除非他是机器人。”这位武官指出，关于开战问题，裕仁天皇知情并下令战争准备、舰队部署、舰队任务，决定最终时刻与美国外交斡旋一旦成功 292
则开拔舰队并制定开战时间等等，正是天皇责任的证据。

天皇没有想到的只是（包括东条英机，任何人都没有料到）：在美国政府接到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正式断交的通知之前，珍珠港袭击就发生了。断交通知没有及时送达的原因，竟然是荒唐的人为过失：大使馆职员打字的时间太长了。除去这个未能预料的、无疑使突袭看起来尤为“卑劣”的缘故，裕仁预先十分明了珍珠港作战概要，这正是选择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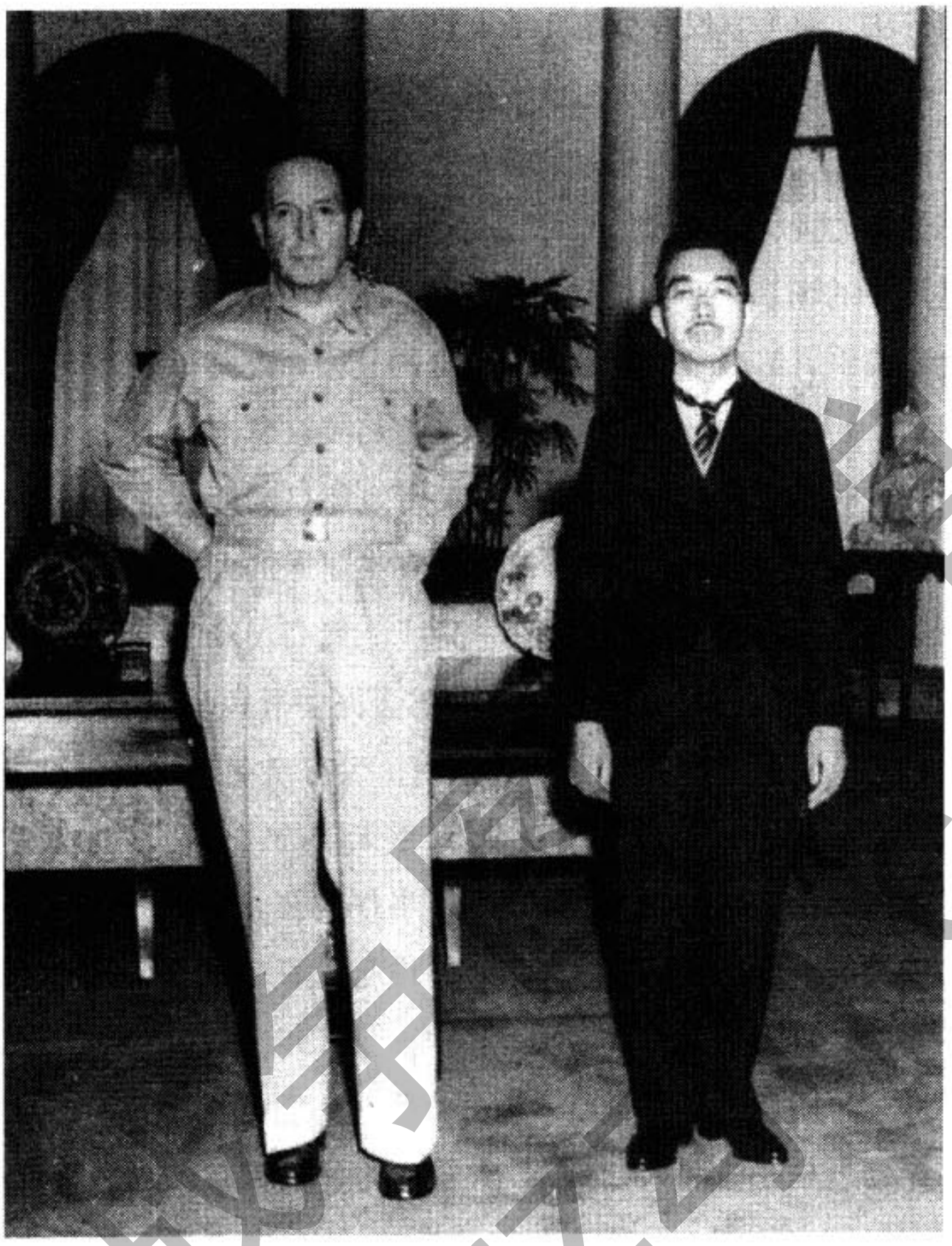
天（“安息日”）发动奇袭的原因。与广为引用的《纽约时报》“访谈”传达的印象相反，他是在完全了解军部企图的情况下，签署了开战诏书。[30]

然而，据泄露的实情却是，一些政府机构并未参与拯救天皇的战略，尤其是内务省。内务省在投降后 6 周、美国人到达 1 个月后，仍然支配警察机构和施行审查。9 月 29 日，当天皇在《纽约时报》的会谈被日本媒体报道时，内务省官员试图压下这些冒犯性的新闻报道。他们反对国内报刊登载天皇有关珍珠港事件的声明，并非是以失实为由，而是因为挑出自己的近臣之名使之承受公众批判，有损天皇的尊严。据主管审查的官员的说法是“不味”（不适当）。

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整个日本遭遇了下面的这幅照片。刊登在同一张报纸上的这幅照片，堪称整个占领时期最著名的视觉影像。它使天皇的“访谈”大为失色，使内务省的审查官大为震惊（这真是让检查人员足够难受的一天），也成了他们试图召回这些报纸的另一原因。照片拍摄的是麦克阿瑟与天皇并肩站立在将军府邸，谁更大权在握，从照片上看起来一目了然。最高司令官身穿卡其布衬衫，敞着领口，未佩戴勋章，双手放在臀后，双臂略微叉腰，姿势有点随意。他的个子高出天皇不少，天皇则身穿常礼服，僵硬地站在他的左侧。甚至是两位领导人年龄上的差距，也增强了将军资历上的优势。麦克阿瑟当时 65 岁，裕仁天皇 44 岁，是年轻得足以做他儿子的年纪。

293 这次发生在 9 月 27 日的会晤，其提议通常被归功于吉田茂。另一方面，马士伯上校宣称，是他在投降仪式的第二天向日本外务省的冈崎胜男转达了邀请。[31] 无论如何，拍照是由麦克阿瑟提议的，而决定将其公之于众，则显露出他长期致力于公共关系的敏锐触觉。这张照片建立起了麦克阿瑟广为人知的权威形象，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天皇的接纳。还有一个未曾料到的效果，最高司令部禁止内务省试图召回刊登照片的报纸，使新闻自由藉此得到确认。

当时总共拍摄了 3 张照片。其中两张由于两位主角未摆好姿势而不能用（其中一张，麦克阿瑟闭眼了，而天皇张着嘴；另一张天皇还是张着嘴）。快门一闪所摄下的偶然情形，往往记录了我们对于重大事件的理解。僵化的天皇崇拜者，如内务省的审查官们，立即将报上登的照片



这张著名的照片，摄于1945年9月27日麦克阿瑟将军与裕仁天皇初次会见之时。在日本报纸上发表时，曾引起轰动。快门一闪，确定了麦克阿瑟的权威以及他将支持天皇的事实。

视为骇人的犯上不敬。实际上从任何方面看来，照片上所显示的身高、姿势、年龄和场所，的确使天皇处于下风。审查官们对画面的解读是正确的，但是缺乏想象力。这张照片标志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大多数日本人彻底理解了他们已经被打败，现在是美国人说了算了。同时，还有一点被审查官们和过度紧张的极端爱国主义者所忽略，照片明白地展示了最高司令部对天皇的接纳，他们将会站在天皇的一边。[32]

会见安排低调，并未在麦克阿瑟的办公地点举行，而是在原美国大使馆建筑中他的私人寓所。天皇乘坐他那辆定制的劳斯莱斯，身着正式的燕尾服、头戴礼帽于10点准时抵达，还出乎意料地随行带来了几车

卫兵和侍从。而美方仅有少数几个人目睹了天皇的到来，其中包括费勒斯和狂热的歌舞伎爱好者法比昂·鲍尔斯（Faubion Bowers）。据鲍尔斯后来描述，两位“帝王”的初次会见，有点像歌舞伎的场面，或者英国剧作家吉尔伯特（Gilbert）和作曲家沙利文（Sullivan）的轻歌剧《日本天皇》中的场景。费勒斯和鲍尔斯向天皇敬礼，天皇陛下鞠躬还礼，并与他们握手。然后鲍尔斯接过了天皇的礼帽，此举似乎是向怀着可怕的预感到来的天皇发出警示，他的一切都将要被拿走了。

295 正在此时，麦克阿瑟突然出现，“用他那打动所有在场的人的闪亮的金子般的洪亮嗓音说道，‘非常、非常欢迎您的到来，先生！’”这是鲍尔斯第一次听到将军称别人为“先生”。最高司令官伸出手紧握天皇的手，同时天皇深深地躬身还礼，以至于握手礼就在他的头顶上方结束。然后麦克阿瑟火速将天皇请进室内，仅有皇室通译奥村胜藏同行，留下费勒斯和鲍尔斯两位尴尬地招呼束手无策的宫廷侍卫们。鲍尔斯提起歌舞伎的话头，后来他还可能谈到了牛仔竞技表演。费勒斯提到自己曾作为埃及国王法鲁赫的随行人员，并说起沿着尼罗河猎鸭的经历，一位侍从问他是否愿意到皇宫地面上猎鸭。这几句闲谈，后来竟引出向盟军司令部高官们连连发出参与“皇室猎鸭”的邀请。[33]

将军与天皇在一起大约呆了40分钟，而原则上双方都同意对会谈的详细内容保守秘密。后来这两位又会见了10次，每次会谈内容都保密。显然，麦克阿瑟一方甚至对会谈内容都未作记录，而日方翻译的记录除去三次例外，一直都未公开。[34]通过这些举动，最高司令部有效维护了围绕着天皇宝座的“菊幕”，甚至增强了天皇的神圣超越之感。事实上，此后的数月间，占领军当局通过拒绝批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认真调查，甚至禁止询问天皇本人他的忠良臣下们将被审判的相关事由，从而将“菊幕”拉得更为紧密。

对9月27日重要会见内容的保密，使得双方可以提供各自的说法。麦克阿瑟利用此机会，美化天皇的形象，称其为“日本第一的绅士”。他告诉副手们，裕仁曾提出由自己承担战争的责任，后来又将这种英雄主义的叙事在自传中公开发表。[35]数日之内，日本方面公布的消息也有唱和同工之妙。内务省的发言人，巧妙地夺回了因天皇照片事件丢失的颜面，声称麦克阿瑟给天皇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天皇自称对迄今

为止的占领进程“十分满意”。发言人还强调，麦克阿瑟将军“表示占领的平稳进行，实有赖于天皇的领导能力”。此说法及时在西方媒体上 296
加以披露，而且从未受到盟军司令部的反驳。[36]

正如麦克阿瑟常常讲到的许多故事一样，他宣称天皇自愿承担战争责任的说法，看来至多是对天皇实际发言的有创意的修饰。因为，天皇的通译奥村胜藏随后的详细记录，终于在 30 年后问世了。会见记录与日本内务省发布的情况相近。从这份在非公开前提下做成的会议记录看，天皇从未提出自己承担战争责任，反倒是最高司令官的表现有逢迎之嫌，满怀敬畏地对“陛下”表示亲善，并在言谈之间表现得格外关切。

根据奥村的记录，很难说清是谁拜会谁，尽管麦克阿瑟显然主导着谈话。在彼此交换过开场的客套话之后，将军切入了通过原子弹爆炸生动展示现代战争之恐怖的冗长独白。然后，简直像天皇终战诏书的回声一般，他赞扬裕仁终止战争的“御英断”，使日本人民免遭了不可估量的灾难。显然是针对那些呼吁天皇应作为战争罪犯受审的世界舆论，麦克阿瑟悲叹那些从未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们的“仇恨和复仇的情绪”，尤其指出美、英、中国媒体的公众舆论“令人遗憾的”刺耳之音。

依据奥村的记录，此处天皇插话声明，他曾想极力避免战争并遗憾最终发生了战争。麦克阿瑟抓住时机强调说，他十分理解天皇如此希望和平，并体谅天皇在公众强烈地倒向另一方向之时，将其引向正确方向的困难。麦克阿瑟庄严说道，只有历史能够评价他们——等他们过世许久之后。考虑到天皇周边对裕仁在世即将受审判的忧惧，这确实安慰人心。此时天皇再次开口。不用说，天皇声明他和他的臣民深切理解战败的事实，他将尽其所能履行《波茨坦宣言》的约定，在和平的基础上重建新日本。

于是，最高司令官向天皇表示了敬意，并确保在占领政策方面的协助以为回报。麦克阿瑟赞赏天皇的“御稜威”（这是奥村的翻译，意即天子广大无边之威德），一声令下，兵士皆放下武器投降，是为明证。 297
麦克阿瑟说，这对于天皇面对今后的目标而言是种鼓舞。奥村引用麦克阿瑟的话，“不用说，没有人比陛下更了解日本和日本人民了”。将军鼓励天皇将来通过他的侍从长或是亲自选定的其他官员，向他传递任何建

议，并保证为这些沟通保密。在略微谈了一些其他话题之后，天皇告辞并表示希望此后有更多机会与麦克阿瑟会晤。最高司令官也表达了见到天皇的荣幸。

据宫中侧近的人士所言，会面之前，裕仁一直紧张不安。鲍尔斯注意到，当他抵达的时候一直在发抖（前一天《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时，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况）。会见结束离去的天皇精神振奋，明显更加放松自信，他当然有理由如此。天皇立即告知木户幸一有关麦克阿瑟对他的赞扬，木户也感到无限欣慰。正如事后木户的记载，如果没有这次会见，维护天皇免受战争罪行的指控将非常困难。翌日，皇后将宫内栽培的菊花与百合花束赠与麦克阿瑟夫人。到下一周，麦克阿瑟夫妇收到了天皇夫妇赠送的精美的饰金漆器文箱。[37]

假使皇室私下对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消息知情的话，他们定会狂喜不已，因为宫中的愿望与司令部的意图，没有根本的分歧。10 月 1 日，麦克阿瑟通过费勒斯准将收到一通简短的诉讼摘要书，清楚表明最高司令部无意认真追查裕仁在以其名义进行的战争中的真正角色。摘要认定以下“事实”：天皇签署宣战诏书并非是行使自由意志；天皇当时“欠缺对实情的正确认识”；他冒着生命危险促成投降。摘要以蹩脚的法律措辞，得出一句“结论”，即“如果欺瞒、威胁或强迫的存在，足以证明（天皇对战争的）否定意图，则民主法庭不能宣告天皇有罪”。摘要以如下“劝告”收尾：

> a. 为了和平占领、日本复兴、预防革命和共产主义，必须收集一切围绕宣战诏书及其后天皇的立场而开展的欺瞒、威胁或强迫的事实；
>
> b. 如果这些事实足以确立对天皇的辩护，但是仍然无法打消那些常规的疑虑的话，则应采取积极行动，避免将天皇作为战争罪犯提起控诉。[38]

第二天，费勒斯准将为麦克阿瑟单独准备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更为详尽地说明，为何收集这些减轻罪行的“事实”势在必行。费勒斯备忘录的提出，早于总司令部的《人权指令》，早于日本言论自由的许可，

早于政治犯获释，早于对“战争责任”的最基本问题的明确规定，早于对舆论动向的认真调查，也早于日本人“国民主权”提法的合法化。备忘录全文如下：

日本人对他们天皇的态度通常让人难以理解。不像基督徒，日本人没有上帝可以交流。他们的天皇是民族活的象征，体现着他们祖先的美德。他是民族精神的化身，不容许犯错或是犯罪。对他的忠诚是绝对的。尽管没有人怕他，所有人都对他们的天皇虔诚地敬畏。他们不接触天皇的圣体，不直视他的天颜，不与他对话，不践踏他的影子。他们对他卑屈的臣服，是由宗教的爱国感情支撑的自我牺牲，其深度对西方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接受天皇与国民或官吏同等的观念，是一种亵渎。将其作为战争罪犯审判，不仅是对神明的不敬，而且是对精神自由的否定。

1941 年 12 月 8 日，天皇签署开战诏书，是他当时作为主权国家的元首拥有签署之权利，是其职责使然。来自最上层的可靠情报，可以确定战争并非出自天皇本意。他亲自说过，他无意将开战诏书像东条英机那样使用。

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拥有选择自己政府之固有权利，这是美国人的基本观念。如果日本人有此机会，他们将选择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性元首。大众特别热爱裕仁。他们觉得他亲自向民众讲话，使他前所未有地与他们贴近。他愿望和平的终战诏书，使他们满怀喜悦。现在他们知道他不是傀儡了。他们感到天皇的存续，不是得到他们有资格享有的自由政府的障碍。

在实行我们不流血的进驻之时，我们在军事上利用了天皇。天皇的命令，使七百万士兵放下武器并被迅速解散。天皇的行动，使数十万美国人避免伤亡并使战争之终结比预定大为提前。因而，在大大利用了天皇一番之后，让他因战争犯罪受审，对日本人来说，无异于背信弃义。此外，日本人觉得《波茨坦宣言》中无条件投降的要点，意味着保存国体，包括天皇。

如果天皇因战争罪行受审，政府机构将会解体，大规模暴动在所难免。国民将默默忍受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屈辱。尽管他们被解

除了武装，混乱和流血还是会发生。那就必须派遣大规模的军队与数千名的行政官员。占领期将被延长，而且我们会失去日本人的信赖。

美国的长远利益，需要与东方保持在相互尊重、信任和理解基础上的友好关系。最终从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着来，不能使日本怀有持久的怨恨。[39]

总司令部对拯救、利用天皇的承诺是坚定的。燃眉之急是打造利用价值最高的天皇形象。

鉴于当时同盟国阵营中公众舆论的反对声浪，看起来这是个棘手的挑战。总司令部十分清楚美国国内对天皇的深切憎恶。当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倾向于将天皇视为具有号召力的“摆设”，既可以利用于战争，也可以轻易为和平所用之时，舆论主流对这些主张却不见容。终战前6周进行的一项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显示，70%的美国人支持绞死或是严惩天皇。9月18日，美国参议院也加入了国民的呼声。10月16日，麦克阿瑟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指令，“迅速展开对裕仁参与并导致日本侵犯国际法的所有证据的收集工作”。直到1945年底，美国对改革甚至完全废除天皇制的政策问题，尚未有定论。同时，由多国组成、作为占领日本之顾问委员会的“远东委员会”，延迟到1946年初才成立。由在战争中日本敌对方的中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苏联代表组成的远东委员会的成立，使反对天皇制的紧急协调行动成为可能。东京的占领军当局，深切关注事态进展，感到在外部压力使他们束手之前，迫切需要改变天皇的形象。[40]

在此氛围下，费勒斯以及其他人，毫不犹豫地向皇室拥护派提供个人的鼓励和建议。接近10月底，费勒斯竟然提醒一位私交甚密的日本中将，天皇对偷袭珍珠港的责任，对美方而言仍然是“最重要、决定性的”问题，敦促他拿出为天皇“全面辩护”的好办法，帮助麦克阿瑟应付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显然，这一接触立即被报告给了内阁书记官长：“麦克阿瑟与费勒斯都对陛下极有好感”，并将“设法在不使天皇困扰的情形下解决难题”。假使这些左右历史的暗箱操作建议在当时为人所知，将会成为一时之丑闻。[41]

在接下来的数月间，保皇派和他们的美国支持者，为如何最好地保护和利用天皇笨拙地奔波起舞，有时听错节奏，经常踏错节拍。然而最终他们的勾结合作卓有成效，为天皇披上了新的衣装，保证了他的人身安全，并将天皇的宝座安置于新的民主国家的中心位置。在此进程中，皇室周边与占领军上层之间，培育出公然的、惊人的亲善深交。日本皇室带头行动，善于发挥长才，很快就抓住了美国人对贵族华丽排场的热爱之情，定期邀请占领军高官们参与宫中优雅的娱乐消遣。由艺伎陪侍的宴饮成了与占领军中级官员交往的最佳场所，但是招待占领军高层的上流活动，则优雅精致得过分。捉萤火虫、到皇宫看樱花、挖竹笋，欣赏宫中传统的御前武道表演，甚至偶尔的猎野猪。然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被邀请参加宫中的猎鸭活动。11 月 4 日，20 位 GHQ 高官首次被邀 301
请前往猎鸭。此后数年间，有时这样的猎鸭招待多达每周两三次。麦克阿瑟将军本人，从未屈尊参与猎鸭或任何其他此类活动，但是其夫人和幼子阿瑟却欣然前往。正要将天皇最忠诚的臣仆处以绞刑和监禁的东京战犯审判的审判长与美方的首席检事也欣然前往。[42]

日本皇室的猎鸭，与西方用猎枪将野鸟毙命的活动完全不同。客人们在皇室的猎鸭场集合，在那里野鸭（绿头鸭）、水鸭和其他猎禽已经被引诱到下过米饵的狭窄沟渠和水道。宫廷侍卫出迎来客，转达天皇的热忱欢迎，并简要说明如何捕捉野鸭。每位猎人手持一张看上去像是捕鱼的大网埋伏等候，直到猎场看守人给出信号，大家就进入满是进食的野鸭的水道。客人们网住受到惊吓试图飞走的禽鸟，然后再集合移入另一条水渠。

正如一位美军少将所描述，“我们四五个人从水渠两侧突进，高举着网。这时鸭子们直往起飞。我们猛扑下去，当鸭子经过的时候，手中的网嗖的一声挥过去，通常就能逮到一只。我个人的平均击中率是60%。跟谁比都是好样的”。从猎人手中逃脱的鸭子，有时会被猎鹰扑中，那可真是与宫廷气氛相称的优雅高贵的一击。等到挥网运动结束，客人们转到附近的建筑中休憩，坐在日式的矮桌旁，品尝日本米酒。宫中的大厨，为他们在小巧的木炭火盆上烤着片好的鸭肉。[43]

对许多盟军将校和文职高官而言，日本皇宫中的猎鸭，是他们在异国土地上短暂的贵族生活中最值得回忆的瞬间。在这种活动中或者其他

场合，他们甚至可能期望得到一件饰有日本皇室菊花纹章的小礼物。当美国媒体得意并热心于将日本“美国化”之时，日本人正静静地、巧妙地使美国人日本化。

这是征服征服者的挑战。

注释：

1 《战阵训》于1941年1月向日本军队全体士兵发布。此书所引的英文译本，是日本在菲律宾的军队发放的官方（英文）译本。《国民の道》的官方（英文）译本，作为附录收入 Otto B. Tolischus 的 *Tokyo Record*（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43）一书，pp. 405－427。

2 1946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宣布继续使用年号制。参见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の全记录》（东京：讲谈社，1989），第7卷，p. 324。此文献下引为 *SNNZ*。

3 可参见高桥纮，《陛下、お寻ね申し上げます》（东京：文春文库，1988），pp. 212，217。

4 Grew 的见解，见于其1945年10月25的信。在 Masanori Nakamura 的 *The Japanese Monarchy：Ambassador Joseph Grew and the Making of the “Symbol Emperor System”，1931－1991*（Armonk，N. Y.：M. E. Sharpe，1992）一书中有全文引述，p. 85。

5 John W. Dower，*Empire and Aftermath：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1878－1954*（Cambridge，Mass.：East Asian Studies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8），p. 321.

6 除非另行注明，此处所引 Bonner F. Fellers 的论文，现藏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Hoover 战争与和平研究所。“The Psychology of the Japanese Soldier”与“Answer to Japan”两篇论文，存于此文献档案 box 1，Fellers 的谈话见于 box 3。

7 摘自 Fellers 1944年12月31日信；见 Fellers 文献 box 3。

8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SWPA，1944－1945”，p. 6。亦参见“Basic Military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1945年4月12日，p. 18；见 Fellers 文献 box 3。

9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略作战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R & A No. 2395，“Objective H”（1944年7月28日）。这份简短的备忘录的影印件（出自 U. S. National Archives，Diplomatic Branch），存于日本大藏省的档案中。

10 Fellers，“Basic Military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4月12日），p. 19.

11 Fellers，“Answer to Japan”，pp. 22－23.

12 Fellers，“Basic Military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with appendices and 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 o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Manila，1945年5月7－8日，pp. 2－3，7－10，14；Fellers 文献 box 4。关于早期10条要点的版本，参见战略作战局（O. S. S.）文件“Basic Military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Theater”，署1943年6月9日，出处同上。亦可参见

1944 年 8 月 2 日重新修订的“Basic Plan”，p. 1，出处同上。（许多的此类文件，也被归入 Hoover 研究所 Fellers 文献 box 1 的“U. S. Army Forces in the Pacific, Psychological Warfare Branch”中。）

13 Fellers，“Basic Military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5 月 7 – 8 日），pp. 10，11，13，18，22，31 – 32。

14 Fellers，“Basic Military Plan”，p. 32。Fellers 将 Mashbir 视为他的三位“最杰出的日本心理与语言权威”之一；参见 Fellers 文献 box 3 中 1944 年 12 月 19 日信函。Mashbir 怪异言行的记录，见 Sidney Forrester Mashbir，*I Was an American Spy*（New York：Vantage，1953）。

15 Fellers，“Basic Military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4 月 12 日），pp. 7，15.

16 这些广播稿的英文版，播送于 1945 年 7 月 19 日 – 8 月 13 日之间，收入 Mashbir 前引书，pp. 354 – 368。

17 这些关于爱上日本、如何对待企图投降的日本兵的评论，参见麦克阿瑟纪念馆（Norfolk，Va.）所收藏 Bonner Fellers 文献，前者见于 RG 44a，box 4，folder 23；后者见于 box 1，folder 5，及 box 6，folder 9。Fellers 批评轰炸日本的备忘录，见于 Hoover 研究所所藏 Fellers 文献，box 3。

18 Fellers1945 年 8 月 7 日的备忘录，现存于 Hoover 研究所的“U. S. Army Forces in the Pacific，Psychological Warfare Branch”分类文献中，box 1。

19 Robert O. Egeberg，“How Hirohito Kept His Throne”，1989 年 2 月 19 日《华盛顿邮报》；亦收入 Stephen S. Large，*Emperor Hirohito & Shōwa Japan：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p. 135 – 136。D. Clayton James，*The Years of MacArthu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vol. 2，pp. 773 – 774。Mashbir 前引书，pp. 308，333。1946 年 1 月末，英国外交官与日本问题专家 George Sansom 密报 MacArthur，天皇“自始至终都是傀儡，完全是个‘Charlie McCarthy’（美国大受欢迎的广播节目 *Edgar Bergen and Charlie McCarthyz* 中的木偶），他既非宣战者也非终战者”；参见 Roger Buckley，“Britain and the Emperor：The Foreign Office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Japan，1945 – 1946”，*Modern Asian Studies* 12. 4（1978），pp. 562 – 563。

20 引自 Herbert P. Bix，“The Shōwa Emperor's ‘Monologue’ and the Problem of War Responsibility”，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8. 2（1992）：302。这篇颇有价值的文章，利用了 1989 年裕仁去世之后披露的许多日本资料。

21 引自 Ōkubo Genji，*The Problem of the Emperor System in Postwar Japan*（Tokyo：Nihon Taiheiyō Mondai Chōsakai，1948），p. 9；亦可参见 Bix 前引文，p. 303。

22 重光葵的谈话，参见鹤见俊辅、中川六平编《天皇百话》（东京：筑摩书房，1989），下卷，pp. 27 – 29。

23 前引之《天皇百话》，下卷，pp. 33 – 37。

24 对天皇在终战时所担当的更为暧昧的角色之分析，见 Herbert Bix，“Japan's Delayed Surrender：A Reiinterpretation”，*Diplomatic History* 19. 2（Spring 1995）：pp. 197 – 225。

25《天皇百话》，下卷，pp. 39 – 40。

26 天皇关于王权的苦恼，参见寺崎英成与 Mariko Terasaki Miller 编，《昭和天皇独白录——寺崎英成御用挂日记》（东京：文艺春秋社，1991），p. 126；亦参见藤原彰、粟屋宪太郎、吉田裕等，《彻底检证·昭和天皇“独白录”》（东京：大月书店，1991），pp. 16－17。

27 木下道雄《侧近日志》（东京：文艺春秋，1990），pp. 48－49。此书是天皇的侍从次长木下道雄的日记，价值难以估量。

28 《纽约时报》，1945 年 9 月 22 日；可比较 Buckley 前引书第 562 页注释所引《伦敦泰晤士报》。

29 《纽约时报》，1945 年 9 月 25 日；《天皇百话》下卷，p. 47。当时，《纽约时报》记者 Frank Kluckhohn 通过翻译与天皇交谈了十分钟。Frank 发现，在这次史无前例的访谈中，竟然规定他“不许提问”。

30 木下《侧近日志》，p. 34。木下在 11 月 8 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份报告。亦可参见藤原彰《统帅权と天皇》一文，收入远山茂树编《近代天皇制の展开》（东京：岩波书店，1987），p. 219。实际上，当时日本新闻界已经明确报道，裕仁天皇批准向同盟国宣战并知悉袭击珍珠港的计划；可参见 1945 年 10 月 9 日、27 日《朝日新闻》。

31 《天皇百话》下卷，pp. 42－44；Mashbir 前引书，p. 333。松尾尊兊《象征天皇制の成立についての觉书》，载《思想》1990 年 4 月号，p. 8。亦参见松尾关于天皇与麦克阿瑟首次会见的深入分析：《昭和天皇——マッカーサー元帅第一回会见》，《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二九卷，1990 年 3 月，pp. 37－94。

32 《天皇百话》下卷，p. 47。这次会见及照片如何成为彻底投降与战败的象征的例证，参见渡边清《砕かれた神——ある复员兵の手记》（东京：朝日选书，1983），p. 32。

33 Faubion Bowers，“The Day the General Blinked”，《纽约时报》，1988 年 9 月 30 日；Bowers 访谈的日文版与英文版，分别参见《读卖新闻》1988 年 1 月 27 日的日文版与英文版。

34 日本宫内厅和外务省对天皇与麦克阿瑟 11 次会见记录的公开非常慎重；参见秦郁彦《天皇の亲书》，载《文艺春秋》1978 年 10 月号，pp. 381－382。尽管如此，日方有关 1945 年 9 月 27 日（下文将论述）、1946 年 10 月 15 日以及 1947 年 5 月 6 日会见的记录已经公开发表。

35 Bowers，“The Day the General Blinked”；Douglas MacArthur，Reminiscences（New York：McGraw-Hill，1964），p. 288.

36 《纽约时报》，1945 年 10 月 2 日。

37 奥村的会见记录，参见児岛襄《天皇とアメリカと太平洋战争》一文，《文艺春秋》1975 年 11 月号，pp. 115－119。天皇的反应，参见木户幸一《木户幸一日记》（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下卷，p. 1237。亦参见前引松尾论文（1990 年 4 月），p. 10。

38 10 月 1 日的摘要是由 John Anderton 起草的，亦收入麦克阿瑟纪念馆的 Bonner Fellers 文献中；见 RG 44a，box 1，folder 1。

39 1945 年 10 月 2 日 Fellers 致最高统帅备忘录，藏于 Hoover 研究所的 Fellers 文献，box 3。此备忘录亦收入 William P. Woodard，*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1945－*

1952, and Japanese Religions (Leiden: E. J. Brill, 1972), pp. 360 – 361。

40 有关天皇的国际舆论状况，参见 Kiyoko Takeda, *The Dual Image of the Japanese Empero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美方的考虑，参见 Nakamura 前引书。与此相关的美方档案，见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seri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尤其参见 *FRUS 1945*, vol. 6, pp. 497 – 1015, 及 *FRUS 1946*, vol. 8, pp. 85 – 604。有关民意调查，亦可参见 Buckley 前引文, p. 554; Hadley Cantril 编, *Public Opinion, 1935 – 1946*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392。

41 太田健一编《次田大三郎日记》(冈山市：山阳新闻社，1991)，p. 118；前引 Bix (1992) 文章中亦有引述，pp. 329 – 330。文中提到的日本中将是原口初太郎。这段插曲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昭和天皇去世之后，原内阁书记官长次田大三郎的日记发表。亦可参见 Herbert P. Bix, "Emperor Hirohito's War", *History Today* 41 (December 1991): 18。

42 高桥纮、铃木邦彦，《天皇家の密使たち・占领と皇室》(东京：文春文库，1981)，pp. 53 – 58。

43 Wm. C. Chase, *Front Line General: The Commands of Maj. Gen. Wm. C. Chase: An Autobiography* (Houston: Pacesetter Press, 1975), p. 146 – 147。关于猎鸭活动的照片，参见 "Imperial Duck Hunt", *Life*, 1946 年 1 月 7 日，pp. 96 – 98。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